

## 国际关系

# 犹太民族基金:起源、形成与影响

肖文超

〔摘要〕 犹太民族基金是一个旨在巴勒斯坦及其附近地区为犹太人赎买土地的非政府组织,是犹太民族主义者推行殖民化进程的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其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犹太民族基金的实践活动对现代以色列建国和深层次理解以、巴冲突的根源等重大问题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犹太民族基金;犹太启蒙运动;反犹主义;以色列;以巴冲突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3-0031-36

新世纪以来,以、巴双方依旧冲突不断,中东和平进程显得步履维艰。众所周知,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因素是以、巴冲突,而影响以、巴双方冲突不断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以、巴双方在土地问题上展开的激烈冲突要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锡安主义<sup>〔1〕</sup>运动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推行的早期殖民活动。在推进殖民活动的过程中,犹太民族基金<sup>〔2〕</sup>始终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实现以色列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它是研究阿、犹两大民族历史冲突形成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

由于研究所需资料的匮乏以及语言障碍等问题,目前国内尚没有学者对犹太民族基金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本文旨在介绍犹太民族基金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犹太民族基金的产生过程,深入剖析犹太民族基金参与的众多历史实践活动对现代以色列建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期深化对阿、犹冲突的根源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开辟一个新视角,填补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犹太民族基金起源的时代背景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除了偶然的因素与内在的历史动因以外,都有着潜在的时代背景。

自然,对于犹太民族基金来说,也不能例外。犹太民族基金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与哈斯卡拉<sup>〔3〕</sup>运动、反犹主义和犹太移民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犹太民族基金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考察,是深入研究犹太民族基金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条件。

哈斯卡拉运动,又称为“犹太启蒙运动”,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区兴起的一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社会文化思潮。它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首先源自德国的柏林,而后逐步向东发展,波及到奥地利、波兰、立陶宛和俄国。可以说,欧洲的启蒙运动孕育了哈斯卡拉。国内学者张倩红专门撰文论述启蒙运动对哈斯卡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欧洲启蒙运动造就了哈斯卡拉的领导层;启蒙理念是哈斯卡拉的主体理念,理性与科学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理念;欧洲启蒙运动为哈斯卡拉营造了理想的客观氛围。”<sup>〔4〕</sup>在这场运动中,犹太学者们提倡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发展世俗化教育,试图通过与当地社会的结合,使犹太人逐渐融入东欧文化的主流,摆脱受歧视、受排挤和攻击的地位,进而取得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权利与自由。为此,马斯基尔<sup>〔5〕</sup>们“号召犹太人更快地提高生产率,从事更有益、更高尚的职业。这样不会阻碍国内市场的扩大,而且赢得非犹太邻居的尊敬。”<sup>〔6〕</sup>另外,他们更加想当然地认为启蒙运动的世俗化纲领可以解决犹太人社团生活中涉及到的

绝大部分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俄国启蒙运动的著名诗人犹大·莱布·戈登及其同时代人摩西·莱布·利林布鲁姆(Moshe Leib Lilienblum)不时地规劝犹太人一定要现代化,必须像俄国人那样穿戴和举止,熟悉俄国文学和俄国的生活方式,但同时又要适当保留自己的个性。<sup>[7]</sup>

总的来说,启蒙运动的犹太学者们试图通过走同化的道路,废除犹太人的教条主义,拆除犹太区的精神壁垒,主动融入异国的主流思潮与文化,依附于当局政府来获得自由与解放。

然而,好景不长。19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反犹狂潮。以沙皇俄国为例,1881年,随着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沙皇政府进行了疯狂的反犹大屠杀。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推出了更加残酷的反犹政策——即奉行“用迫害的手段去改变1/3的犹太人信仰,驱逐1/3并屠杀1/3”的方案。<sup>[8]</sup>“五月法案”的推行和栅栏区的设立,使企图走同化道路的启蒙学者们存在的幻想被彻底粉碎。这同时也激起犹太人的自我觉醒,开始重新考虑本民族的前途。于是,许多宣传锡安主义的小组织开始悄悄地在俄国兴起。1882年初,由一批犹太知识分子成立的“热爱圣山运动”(Lover of Zion)组织,发出了回归巴勒斯坦的口号。热爱圣山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列奥·平斯克(Leon Pinsker)对反犹太主义的原因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资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他们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sup>[9]</sup>正是由于这样,犹太人才有了这悲惨的一幕幕。

1884年,卡托维茨会议召开,列奥·平斯克在会议开幕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回到土地上去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因此也被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议程而载入了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史册,同时也正式拉开了犹太移民潮的序幕。

随着东欧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化,东欧犹太人普遍认为东欧已不再是他们理想中的寄居之地,拯救自己的方式只能是离开此地。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881年到1903年期间,大约有100万东欧犹太人移居到海外。<sup>[10]</sup>他们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包括法国、英国、中国、南美等国家和地区,<sup>[11]</sup>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漂洋过海到达了美洲去安家落户,主要是前往美国。另外,在热爱圣山运动“从政治和民族精神上在巴勒斯坦复兴犹太民族,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农耕居民点”<sup>[12]</sup>

宗旨的影响下,1882年1月成立的“比卢”组织的成员,首次掀起了回归圣地的移民运动,史称“第一次阿利亚”(Aliya)。第一次阿利亚期间,大约共有2.5万名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使该地区的犹太人口增加到4.7万人,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867年为1.25万人,1881年2.5万人,1897年5万人,1913年11万人)。<sup>[13]</sup>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设想到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涌入,必然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以及移民安置等诸多问题的产生。如何筹集资金来解决这些即将面临的问题,这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犹太殖民公共机构来进行支撑运作。现代锡安主义运动的崛起,诞生了世界锡安主义运动领导组织,这无疑为犹太民族基金的成立做好了政治上的充分准备。

## 二、犹太民族基金的形成过程

1897年,在政治锡安主义运动领导人西奥多·赫茨尔的倡导下,第1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大会成立了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组织并通过了《巴塞尔纲领》(The Basle Program):锡安主义的目的在于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创建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为达到预期的目标,大会决定采用如下措施:(1)不断鼓励犹太族农人、工匠和手艺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2)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成立的各种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加强犹太民族情感和民族觉悟。(4)采取准备步骤,来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所必要的。<sup>[14]</sup>世界锡安主义运动领导组织的建立表明锡安主义作为现代世界的一支政治力量已经到来,是西奥多·赫茨尔政治锡安主义运动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犹太民族基金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纵观犹太民族基金的成立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1. 犹太民族基金的探索阶段。建立犹太民族基金,最早源于圣经时代犹太民族长期孕育的返乡复国观念。赎买土地反映出流亡千年的犹太人对重返巴勒斯坦地区的强烈愿望。政治锡安主义的先驱——列奥·平斯克曾在著名的小册子《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其同族同胞们的劝告》中呼吁犹太民族需要实现互助,恢复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自主权利。同时,他建议现有犹太人团体召开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研究购买一块土地解决数百万犹太人的

定居问题,同时这种做法应得到大国的支持,以保证这样的安全地区永远存在。<sup>[15]</sup>平斯克所谓的购买土地解决犹太人定居问题主要是为小规模移民作准备,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购买土地的思想为后人所借鉴。

1847年,I·阿尔卡莱首次倡议建立这样一只民族基金。1884年,热爱圣山运动组织在上西里西亚召开了卡托维茨会议,大会收到了摩西·莱布·利林布鲁姆的小册子以及赫尔曼·夏皮拉<sup>[16]</sup>给大会发的一份电报。两人都建议建立一只基金来为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购买土地。但是两人的最大不同是,摩西·莱布利·林布鲁姆设想可以将土地卖给殖民者。利林布鲁姆在1881年的时候就拥护在巴勒斯坦进行农业殖民和购买土地。1883年他又建议设立家庭筹款箱,也就是后来的“蓝盒子”(Blue box)。赫尔曼·夏皮拉则坚决主张“从外国人手中赎买土地,并将它转化为全民族的共同财产,赎买的土地不可以买卖,仅能租借。”<sup>[17]</sup>卡托维茨会议的召开,为犹太民族基金的正式提出作好了前期的筹备。

2. 犹太民族基金的提出阶段。1897年,在第1届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代表大会上,通过建立一只民族的基金扩大殖民和购买土地的提议被赫尔曼·夏皮拉教授正式作为议案提出。一些代表建议将此计划落实到具体行动,结果却遭到了西奥多·赫茨尔的坚决反对。因为西奥多·赫茨尔在那个时候正在计划筹建另一个犹太人的经济机构——犹太银行。这也是西奥多·赫茨尔在他的小册子《犹太国》里提到的两大执行机构——犹太公司和犹太人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8]</sup>西奥多·赫茨尔之所以会反对犹太民族基金计划的原因无非有两个:首先,犹太民族基金的成立会破坏自己的银行筹划,误导资源的利用;其次,犹太民族基金的成立缺少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合法保护和认同,他认为当局的认可是实现犹太殖民成功的前提条件。

西奥多·赫茨尔以自己充分的理由对建立犹太民族基金计划加以阻止。然而,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大会执委会还是要求赫尔曼·夏皮拉对犹太民族基金的提议进行阐述。赫尔曼·夏皮拉首先提出了犹太民族基金成立的三个原则:第一,必须创建这么一只领土基金,以区别其他基金形式;第二,领土基金不能用于其他目的,一切按照协会的章程要求实施;第三,这只基金不能耗尽。随后,他又说“让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的前辈们流亡期间积累了一部分基金,虽然少,却是未来的依托。今天我们有能力用它去购买更多的土地。我

们的先辈们没有做的,忽略去做的,我们有义务去完成它。”<sup>[19]</sup>最后,他还建议,犹太民族基金的筹集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筹集资金的2/3用于购买土地,余下的1/3用于保护和耕种土地。其中购买的土地不可以转让,即使是卖给个体的犹太人。最重要的是,犹太民族基金的管理工作必须始终处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大会的领导之下。根据赫尔曼·夏皮拉的阐述,大会执委会作出了如下决定:大会原则上决定有必要建立一只犹太民族基金和犹太银行。最后要求下一次大会期间提供一个详细的实施方案。

不幸的是,第1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结束不久,赫尔曼·夏皮拉便去世了。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犹太民族基金成立并付诸实施,但是他为犹太民族基金的落实和发展描绘下未来的蓝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被后人誉为“犹太民族基金之父”。

3. 犹太民族基金的形成阶段。赫尔曼·夏皮拉去世以后,围绕犹太民族基金的成立问题,又经历了一些波折。1898年8月,第2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再次在巴塞尔召开。大会批准了西奥多·赫茨尔提出的建立犹太银行的计划。该计划于1899年在英国成立犹太殖民托拉斯得到具体落实,而对于犹太民族基金的提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1900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第4届大会对于成立犹太民族基金原则上同意,并要求提供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提交下届大会讨论。

直到1901年8月,在锡安主义者第5次代表大会上,经过近4个小时激烈的争辩,在大会主席耶希尔·塔希利诺(Yehiel Tschlenow)的主持下最终通过了由约翰·克瑞穆尼斯基(Johann Kremenezky)准备的提案,犹太民族基金获准正式成立,并由约翰·克瑞穆尼斯基出任第一届犹太民族基金会主席,总部设在维也纳。根据犹太民族基金会的新章程,基金的75%将用于投资巴勒斯坦,余下的25%应该以现金和容易兑现的有价证券的形式予以保留。犹太殖民托拉斯(Jewish Colonial Trust)是犹太民族基金会的授权银行,正式作为锡安主义运动的财政金融机构。犹太殖民托拉斯成立以后,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在“圣地”有诸多的分支机构。1907年4月8日,犹太民族基金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英国公司在英格兰正式予以合法注册。这是一个协会担保公司,没有资本作为股份分红,公司的章程规定了其财产和收入面向以下目标即“在巴勒斯坦通过购买、租赁或交换所获得的土地和森林,是基金不可剥夺的财产,保证犹太人在这些土地上得以安居。”<sup>[20]</sup>至此,犹太民族基金才正式获得了法律的认可,

一直到 20 万英镑的资金筹措完备之后,才正式开展了土地购买活动。<sup>[21]</sup>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犹太民族基金会的章程中规定可以试行多样化的筹资形式。犹太民族基金原则上是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自愿捐赠,同时民族基金的分委员会存在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中。犹太民族基金会接受捐赠的主要形式包括:民族基金邮票、募捐箱、遗嘱捐赠、金书、橄榄树基金和鲜花节等。犹太民族基金邮票设置形式多样,主要用在信件、卡片、邀请函、书签等;募捐箱,主要是“蓝盒子”,主要放置在犹太人自己的家中,犹太会堂、图书馆等以增加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儿童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金书,一些捐赠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就会留名于书中用来表示尊敬与纪念;鲜花节,主要是在犹太人的诸多节日里,例如犹太人的光明节,<sup>[22]</sup>通过借助鲜花的销售进行筹资,一直是犹太民族基金接受捐赠的主要形式。

可以说,犹太民族基金的成立是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为犹太民族实现千年的复国梦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加速了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为未来的犹太国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 三、犹太民族基金对现代以色列建国产生的影响

自从犹太民族基金在第 5 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获准成立之后,犹太民族基金会作为犹太民族基金的具体管理和操作运行机构,作为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的重要组织机构之一,它在现代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 1. 积极为未来的以色列国赎买土地

建立一个犹太国,回归圣地巴勒斯坦,是在异国流亡犹太人的千年梦想。犹太民族基金成立之后,积极按照自己的章程规定筹集资金并在巴勒斯坦及其附近地区为犹太人赎买土地。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曾经在 1939 年 10 月的一次演说中声称:“扩大我们拥有的土地是犹太复国主义纲领中的首要内容之一。”<sup>[23]</sup>

1903 年 8 月,第 6 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犹太民族基金委员会做了一个关于犹太民族基金工作进程的报告,同时也指出了目前犹太民族基金存在的问题,表达了希望犹太民族基金扩大的意图,并且要求大会正式批准犹太民族基金开始购买土

地。<sup>[24]</sup>1903 年,犹太民族基金会获得了第一份位于哈德拉(Hadera)大约 50 英亩的土地。这份土地是著名慈善家艾萨克·戈得堡(Isaac Goldberg)捐赠的。1905 年,犹太民族基金会拥有的土地扩展到了加利利海岸,巴勒斯坦中心的本舍门(Ben Shemen)。另外,为了纪念西奥多·赫茨尔对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犹太民族基金会特意在胡尔达(Hulda)专门购买了一份土地建立了赫茨尔森林。这些土地是犹太民族基金会从土耳其政府手中购买的,大约 5600 杜纳姆(dunums),<sup>[25]</sup>其中在科法·海蒂姆(Kefar Hittim)购买了 2000 杜纳姆,在胡尔达附近购买了 2000 杜纳姆,在本舍门购买了 1600 杜纳姆。<sup>[26]</sup>到 1920 年,犹太民族基金会拥有所有权的土地仅有 16366 杜纳姆。<sup>[27]</sup>

总体来说,1920 年以前,犹太民族基金会购买的土地是适度的。为什么在这段时间犹太民族基金没有大量购买土地?原因有三点:第一,犹太民族基金会没有足够的基金来购买大批的土地;第二,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严格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第三,1917 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当局关闭了土地注册办公室(Land Registry Office),导致土地购买的合法途径遭到禁止。一直到 1920 年,英国民政管理局重新接管了巴勒斯坦地区。1920 年至 1944 年间,英国当局委任统治时期,在当局的妥协状态下,犹太民族基金会积极购买土地,获得的土地总数是 927165 杜纳姆,其中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手中获得的土地是 454860 杜纳姆。截止到 1948 年 5 月,犹太民族基金会已经拥有了 96 万杜纳姆,<sup>[28]</sup>占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所拥有土地总面积的 54%,犹太民族基金会已经成为了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 2. 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建设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位于扎法市附近,它可以说是犹太殖民者在巴勒斯坦地区最杰出的殖民成果。它的形成与犹太民族基金会提供的贷款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支援特拉维夫及其周边地区城市建设,犹太民族基金会于 1907 年为其一次性提供了 30 万法郎的贷款。<sup>[29]</sup>除了支援特拉维夫市的城市建设以外,海法的住房建设也获得了犹太民族基金会为其提供的贷款。同时,犹太民族基金不断地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企业经营者提供资金支持,确保这些企业得以正常运转,带动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进而为犹太移民的安置提供便利条件。犹太民族基金会提供的贷款有效地解决了特拉维夫和海法的住房建设和城市规划问题,同时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也得到充分的实质性进展。

### 3. 全面支持巴勒斯坦地区公共事业的发展

犹太民族基金会除了为犹太人赎买土地和支援犹太定居点城市建设以外,犹太民族基金以实际行动支持着巴勒斯坦地区科、教、文、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据资料记载,犹太民族基金会曾援建了比撒列(Beza-lel)工艺美术学校,给 500 多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花费了 4000 英镑建成了海法技术研究院,在特拉维夫花费了 8000 英镑建成了希伯来中学,花费超过 4000 英镑为也门犹太人建设房屋,也曾为以反疟疾为目标的医疗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等等。<sup>[30]</sup>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结的话,那就是犹太民族基金会始终以最务实的方式来支持着巴勒斯坦的公共事业,大大推进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化进程。

由此可见,犹太民族基金事实上已经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者实现复国梦想的一种有力的政策工具,在现代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基金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元政治与社会因素不断融合的结果。犹太民族基金从提出到最终付诸实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犹太民族基金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这种政治功利性主要体现在犹太民族基金的土地购买政策上,其最终的目的是为未来的以色列国积累国士资本。1940 年,美国犹太民族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委员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量为可能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其次,纵观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地区所参与的所有历史实践活动,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基金会虽然本质上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却发挥了政府的特殊职能。

不可否认,犹太民族基金对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但是,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土地政策对阿、犹两大民族的历史冲突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更不能被我们忽视。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犹太民族基金购买的巴勒斯坦土地中,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阿拉伯的地主,而地主的土地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对当地贫苦农民的挤占和盘剥;另外一部分土地来源于阿拉伯当地的贫苦农民由于生活所迫而出卖的土地;第二,犹太民族基金章程中存在霸权规定。例如,用它

的资金购买的土地,被视为全体犹太人不可分割的财产。也就是说,土地一旦被犹太民族基金会买到手就永远不能卖给阿拉伯人,而且也不能雇佣阿拉伯人在购买的土地上做工,阿拉伯人必须永远的离开已经出卖的土地,结果就导致了“阿拉伯人从犹太人的资本输入以及扩大社会服务和教育两方面都未能受益”。<sup>[31]</sup>长此下去,必将引起阿拉伯人的不满。

为此,文化锡安主义的倡导者——阿哈德·哈姆(Ahad Ha'am)<sup>[32]</sup>在 1891 年访问巴勒斯坦时的报告《以色列地的真相》中说:“城镇中的阿拉伯人十分清楚犹太人的活动和愿望,但是只要他们没有构成真正的危险,就装作不注意他们。如果犹太人变的真正强大起来,威胁到阿拉伯人的优势,他们就不能平静地容忍这个事实了。”<sup>[33]</sup>随着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逐渐站稳脚跟,移民人数的增加,土地需求的增多,再加上犹太民族基金对土地的无限制购买以及购买的土地对阿拉伯人的限制使用等,终于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危机,这也是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产生排斥的主要动因之一。长期以来,这些因素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日后阿、犹两大民族发生大规模暴乱乃至流血冲突埋下了因子。

### [注释]

- [1] 锡安主义(Zionism),又译作“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两种译法的考辨,参见李平民:《锡安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考辨》[J],《历史教学问题》2002 年第 3 期。
- [2] 犹太民族基金,英文名称“Jewish National Fund”,又译作“犹太国民基金”,简称“JNF”;希伯来语中称作“Keren Kayemet Le-Israel”,简称“K. K. L.”。
- [3] 哈斯卡拉,源自希伯来语“Haskalah”的音译,意指“启蒙”。
- [4] 参见张倩红:《犹太启蒙运动初探》[J],《世界历史》2002 年第 5 期。
- [5] 马斯基尔,源自希伯来语“Maskil”的译音,意思是启蒙运动倡导者。
- [6] [7] [以]阿巴·埃班:《犹太史》[M],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58 页,第 259 页。
- [8] [11] [英]布拉恩:《犹太民族史》,倪秀章译,商务印书馆,民国 28 年版,第 334 页,第 335 页。
- [9] [31] [33]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p. 72, p. 245, p. 210.
- [10] [13] Adolf Bohm,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The Hague: The head office of Jewish national fund, 2003, p. 12, p. 46.
- [12]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99 页。

- [14] The Basle Zionist Program, <http://www.mideastweb.org/basleprogram.htm>.
- [15] Leon Pinsker, *Auto-Emancipation*, <http://www.mideastweb.org/autoemancipation.htm>.
- [16] 赫尔曼·夏皮拉(1840—1898),一位犹太拉比,来自海德堡的大学数学教授,1840年出生于立陶宛,早年在普鲁士和德意志接受教育,与热爱圣山运动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支持希伯来语的文化复兴和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移民定居。1882年,他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犹太人自己的大学。1884年,在卡托维茨会议上,他提议建立一只犹太民族基金来赎买巴勒斯坦的土地。1897年,在第1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上,对建立犹太民族基金的计划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刻的阐述,被誉为“犹太民族基金之父”。
- [17] David Blougrund,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Policy Studies No. 49, September, 2001, p. 2.
- [18] 参见[奥]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M],肖宪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0—73页。
- [19] Walter Lehn,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 No. 4. (Summer, 1974), p. 76.
- [20] [30] Joseph D. Jacobs,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London: The Zionist, 1907, pp. 1-2, p. 5.
- [21] [以]哈伊姆·格瓦蒂:《以色列移民和开发百年史》[M],何大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 [22] 光明节,又称作“哈努卡”节(Hanukkah),从基斯流月(犹太历9月)25日开始,延续八天。该节日的主要仪式是点燃九枝烛台,第一天点燃一枝灯盏,以后每天增加一枝,直到第八天结束。参见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第523页。
- [23] 黄增强:《试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功的内部因素》[J],《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2期。
- [24] Walter Lehn and Uri Davis,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8, p. 26.
- [25] 杜纳姆,土耳其、南斯拉夫和近东一些国家与地区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1杜纳姆=1000平方米。
- [26] [27] [28] 转引自 Walter Lehn,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p. 81, p. 84, p. 74.
- [29] Katz, Yossi, “The Establishment of Tel Aviv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Jewish Social Studies*, 49:3/4 (1987: Summer/Fall) p. 293.
- [32] 阿哈德·哈姆(1856-1927),原名阿舍尔·Z·金斯伯格(Asher Zervi Ginsberg),阿哈德·哈姆是其笔名,意为犹太民族的一份子,是东欧著名的犹太政论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倡的文化锡安主义,或称“精神锡安主义”对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及其现代以色列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错误的道路》(The Wrong Way)、《自由中的奴役》(Slavery In Freedom)、《精神的复苏》(The Spiritual Revival)等,详细内容可以参阅:Leon Simon, *Ahad H'aram: Essays · Letters · Memoirs*, Oxford: Phaidon Press Ltd, 1946.

作者简介:肖文超,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河南新乡,453007)

收稿日期:2010-03-16

修改日期:2010-03-22

---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5 A Typical Type of Voluntary Reduction of Emissions —California's Climate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hina by Gan Junxian

California's climate governance has a long history, it is not only a pioneer in American climate governance but also has great impact on the world. California's climate governance is a typical type of self-governance, which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a smooth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lifornia's good governance on climate is due to its highly efficient institutions, a perfect legal system, scientific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appropriate incentives. It offers some useful experiences for China.

- 31 A Study of the Origin, 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by Xiao Wenchao

Jewish National Fund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ith the aim of buying land in Palestine and surrounding areas for the Jews. It is an effective policy tool to advance the colonization process in Palestine by Jewish nationalists. Its formation has a complex polit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has undergone a long process. The practice of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Israeli statehood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oot caus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 Theoretical Probes

- 37 The Grand Narrative of Globalization: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A Post-modernist Interpretation to the Text of Globalization by Jin Xin

Post-modernist paradigm has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globaliz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text". By post-modern theory of "double rea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scourse and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xt of globalization can be revealed, so that the concept of centr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text of globalization can be eliminated; by further post-modernist deconstruction, the modernity and universalism of globalization can be criticized, the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grand narrative of globalization will be destroyed. Based on the thorough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text becomes necessary. The post-modern global awareness which transcends modern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hich transcends universalism open up a road to reconstruct the text of globalization.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43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y Wu lin

China in the Cold War Era was a regional power without regional polic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tabilizing periphery" became China's primary diplomatic goal.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is transition period (1989-1995), when the focus was all-around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second is adjustment period (1996-2001), when the periphery policy was conducted around regional key powers and was subjected to great power relations and great power strategy. The third is maturity period (2002- ), which is symbolized by the forming of a policy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sub-regional-bilateral-regional levels.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nat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tructure depends on the trend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feedbacks of periphery nations.